

論語注譯



施達生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沪)新登字 302 号

责任编辑 南 浦

封面设计 石玉玲

论 语 注 译

施建生撰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上海社科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25 字数 220000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80515—983—1/K·156

定价: 9.80元

題辭

福語三家弄筆句。何處皇龍義解村宗風。
多君惜學能知服。族。以。福。允。執。中。
漫誇子都治天下。同學為政地。啟蒙。
朱。月。沂。水。盡。言。志。是。真。孔。學。不。盲。從。

福語注譯同文不待家正

辛未夏至平陽蘇

同書時年十四



苏 序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到底是怎样一种性质的社会？——奴隶制还是封建制初期，或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这个问题，涉及孔子的政治倾向，因而是规定他的学说在当时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乃至反动的关键所在。

几十年来，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争论得比较多，意见分歧也最大。现在，就这个问题，即孔子学说的政治倾向及其社会背景，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兼评时下各家的不同论点。

同是主张西周乃至春秋社会仍是处在奴隶制阶段的学者（以郭沫若为代表，赵纪彬等大同小异），他们出发点相同，可是对孔子的评价都得出了几种相反的结论，而且显有窒碍难通的地方。

（一）既然说西周是奴隶制，而孔子又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大体上是站在人民利益的方面”（郭沫若《十批判书》）；他“并不是站在氏族贵族方面去扼杀国民阶级的历史创出；相反的乃是相应于当时国民阶级的不完全性或者懦弱而提出的一种温和或缓进的改良思想”（赵纪彬《中国思想通史》）；那么，为什么孔子老是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那样倾倒向往于奴隶制的周室典礼呢？

（二）既然说孔子是“维护那日趋崩溃的种族统治”，又是“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立场”调和阶级矛盾的“改良主义者”，

那他又从哪个角度来提倡仁学，一再主张爱民、养民、利民、富民、教民、以达“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目的呢？

（三）既然说“孔子是袒护乱党——乱党在当时都要算是比较能够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郭说），那么，为什么他经常周旋于三桓之间；同时，一听到齐陈恒弑简公，就要“沐浴而朝告哀公”请为讨伐（《宪问》）呢？

（四）孔子学说既然基本上只是要求“将己屈抑在礼的范围之中”，即“要求己在礼的面前应采取屈抑不伸的侏儒态度”（赵纪彬《仁礼解故》），那又如何理解孔子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积极救世精神，以及曾子的“弘毅”，《中庸》所强调的“强哉矫”乃至孟子所扩充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呢？孔子学说又怎能居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上升期的思想指导地位，并且成为先秦诸子、汉宋学术发展的起点和触媒呢？

上述这些矛盾，我想，都是从假定西周春秋是奴隶制、并认为孔子主张礼治、主张正名，想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制统治，和企图恢复西周奴隶制这一论点而起的。反之，主张西周为封建制初期，春秋末叶则为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过渡的说法，倒似乎比较能说明一些问题。

主张这种说法的同志，认为孔子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士阶层在当时是新兴地主阶级，也是新兴家族制度的有力代表”，又说，“封建领主和新起的地主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本质上是一致的。由于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有些区别，因而在政治上的要求也有些区别，但这些区别并不损害他们的一致性。而且在孔子时，新起的地主还不是一个成熟的阶级，它还没有脱离领主、自己掌握政权的势力。孔子学

说代表新起的地主，同时又主张维持领主统治，是可以理解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吕振羽也认为“从中国封建期全过程说来，孔子当时，封建制还正在上升时期。孔子学说虽自始就有消极的方面，但给封建制建立起成套的思想体系，是适应于封建制上升的前进方向 and 要求的。”（《简明中国通史》）

从西周封建制论点出发，我们认为对上述四个问题，可以试行初步的解答。

（一）我们认为孔子称颂周礼，是从“周监于二代”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的角度出发，他并不主张全盘周礼化，只是说“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礼记·中庸》）；“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同时，他又从适应于当时农民个体经济基础的要求出发，所以主张损益因时，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子罕》）；主张“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这是有名的所谓“四代礼乐论”：时取其便，辂取其俭，冕取其文，韶取其尽美尽善。其次，所谓礼，本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章》），历代相承，上下遵守的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的通称；它不只是为当时的经济基础服务，同时更主要的是“从时代的积累所递传下来的人文进化的轨迹”，正是“一个时代里所由以维持社会生活的各种规范，这是每个人应该遵守的东西”（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孔子是深深体会到“礼之本”的，所以强调“礼与其奢也，宁俭”；“忠信之人可以学礼”；“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孔子对于礼的态度，绝不象某些同志说的那么狭隘：“只是教人退让，屈己于奴隶制范围之下，视听言动一以氏族贵族的合法行为为标准”。这样说是忘记了上层建筑除了反映社

会基础并为之服务外，还有它本身的积累过程和独立发展规律的一面了。

（二）孔子仁学虽然站在维护统治者利益的立场，以调和阶级矛盾为出发点，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提法，正是西周以来“重民”思想的发展，自有其提高“人格”的积极意义。因此，他不仅主张以仁对待家属、宗族、亲戚、朋友、邻里（亦即所谓收宗、恤族、敬老、慈幼，乃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及统治阶级人物，而且也主张以礼对待劳动人民（参阅高亨《孔子三论》）；绝不象某些同志所说：“爱人”只是限于“奴隶主阶级”；或者说，“孔子的仁，只是包括当时的王公大人和士大夫的中心骨干”。这里，我们宁可同意郭沫若的说法，孔子所提倡的仁学，正是“要人们除掉一切自私自利的心机，而养成为大众献身的牺牲精神”；不同意某些同志把“克己复礼为仁”仅仅解作“即要宗族中人或宗族以外的被统治的奴隶，大家都能克制自己的欲望，不犯上作乱，……来巩固族有的奴隶制国家”。我想，~~如果~~把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定为封建制初期，抓住了个体经济开始发展的历史契机；这个孔子学说核心——仁的概念，就容易理解得多了。

（三）孔子一方面主张“张公室”、“黜世卿”，同时又同情“执国命”的“陪臣”而“袒护乱党”。这个问题又应当怎样解释呢？我以为孔子的“黜世卿”是为了“张公室”，张公室是要他“尊王攘夷”，也就是为了“大一统”。孔子心目中的政治形式是天子治天下，诸侯治本国，大夫治采邑，“中外远近大小如一”。事实上，“孔子生在东周，只好寄统一的希望于名义上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虽不可能成为事实，但中央集权的统一思想，开始萌芽，实含有进步的意义。因为孔子要用礼乐仁义来求得统一，对战争取反对态度，不了解兼并战争客观

上正是破坏诸侯割据的旧秩序走向大一统的必经路程”(范著《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这是一点。其次，孔子虽是“宪章文武”，维护封建君臣等级支配和宗法制度，以恢复西周政制，但当时君臣等级制已开始向君主专政过渡，孔子也相应地提出“以礼治国”、“以德治人”、“举逸民”、“举贤才”等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等级制的主张。

特别是在周流天下，栖栖皇皇的长期从事政治活动过程中(35岁出国适齐至68岁自卫返鲁)，目睹各国统治阶级上下相克，小民贫困无依，手足无所措的种种社会动荡现象，隐隐窥出统治阶级(封建领主)面临崩溃的命运。所以他到晚年，把当时天下大势概括起来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季氏》)意谓“王朝既成为据有天下的统治阶层，诸侯已成为据有一国的统治阶层，大夫亦成为据有其采邑的统治阶层；是三层者，其后嗣往往昏贪相继，而天下大多数之小民，乃长处于被剥削之地位，终有伸张义愤之一日。……昔之见为有道者，无几何时，而实成无道已极之乱制”(熊十力《原儒》下卷)。此在春秋隐僖时期尚存“自天子出”的过渡形式(葵丘之会尚奉周宰相，践土之会晋文尚两朝于王所)，文公以后，即为“自诸侯出”(《左传·文公十七年》，“公会诸侯、晋大夫盟于扈”)；襄公以后即为“自大夫出”(《左传·襄公十六年》，“三月……大夫盟”)。统治阶级崩溃之势，自上而下不可避免。《易》言“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董仲舒告司马迁语)；《诗》存《变风》《变雅》怨诽之声；则孔子晚年思想之激进，趋于“改制”，实已显然有迹可寻。子游所传《礼运》“大人世及以为

礼”一节，颇见微词，其将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拦入“小康”，不能说不是孔子很大的进步。

（四）孔子虽然受了柔道的儒风影响，要求人们“柔而能刚”，“恭而有礼”，但他却反对“同乎流俗，合乎污世”，“阉然媚于世”的“乡愿”。他是有原则的，“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子路问强，则曰：“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礼记·中庸》）鲁哀公问儒行，他一连就举出十条，其中除“粥粥若无能”和“宽裕”两点近于柔道外，余如“特立”、“刚毅”、“忧思”、“独行”诸节，极富积极进取、刚毅威严的精神，这些都是孔门的重要学风。何曾象某些同志所夸大为“侏儒态度”呢？至于“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教训，给予后世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以道义鼓舞的力量，正是孔学的真精神所在，不容轻轻一笔加以抹杀的。

由此可知，明确了孔子的时代是封建制初期，是处在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过渡的时期，这样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孔子的精神面貌是有益处的。

春秋时代鲁国的社会背景和孔子的政治倾向，似乎还可以进一步作如下的说明。

春秋是我国历史上“诸侯称雄割据”的分裂时代。平王东迁后，王室不再有控制诸侯的力量，侯国兼并（春秋无义战）打破了王室独尊的宗法纽带，接着又出现了侯国内大夫兼并（瓜分公室）强宗得势（陪臣执国命）的局面，特别是宗子世袭不得买卖的宗族土地所有制，向个人私有可以买卖的家族土地所有制转化，成为当时各国经济变动中最基本的特征。这种社会经济和阶级的变化，对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流派的产生、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鲁国富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又处于殷民族长期活动

过的区域，在周王朝先后分封的侯国中，条件最为优越。我们从鲁襄公廿九年(公元前544年)吴季札到鲁国来问乐，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齐景公与晏子打猎后到鲁国来问礼，上溯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晋韩宣子从鲁太史那里看到《易象》和《春秋》，就发出“周礼尽在鲁矣”的赞叹三个事例看来，充分说明了鲁国历来就是保存宗周系统文化最集中的国家；而孔子恰恰是生长在这个周公所治化的邦国里，从小就受了贵族文化的熏陶，十五岁时即以“知礼”名于世。

约当鲁宣公“初税亩”以后30年，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进行瓜分公室(《左传·襄公十一年》)；过了25年(《左传·昭公五年》)，三家对于公室又来一次瓜分，所谓“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这说明鲁国当时社会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氏族组织的破坏，政治上私家与诸侯争夺权力，经济上私家与公室不断争夺土地与人民，而形成“私肥于公”的局面。孔子生逢这个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权逐层下移的鲁国定哀之际，因而在内不得不与三桓周旋，出国也连连不得志于诸侯，栖栖皇皇从政讲学，“发愤忘食，不知老之将至”。实在是一位热心救世、博学多能的维新代表人物。

这个时代历史的总倾向，是从割据向统一行进。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要求废除贵族割据，建立统一的政权。原来垄断在统治者手中的所谓“官学”，也随着士的兴起、贵族下降，逐渐下移了。孔子基于客观有利形势和社会上的迫切要求，首先创设了私学制度。“有教无类”，分科学习，并从私学中形成了学派，扩大了影响，为这一帮包罗很广的士阶层(包括自由民和工商业者)的从政问学打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同时提出相应的仁学，为他们升入上层统治集团(出仕)创设伦理上的根据。孔子总结了周、鲁、杞、宋的历史文

献，整理出古代史系和学统，并把人类的一切美德善行加以提炼，使之更有助于宗族内部的团结，同时对于新兴势力也给以提高道德修养、文化学习的机会。因此，以仁学为核心，大大发挥孟子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的社会伦理本位的精神，并以此为纲，画出改革春秋末期社会现状的蓝图，（春秋三世、礼运大同，不能说不是孔子晚年定论之一）。他68岁倦游返国，赞《易》作《春秋》，直至获麟绝笔，这一时期政治立场大有转变，开始孕育着“同人”、“大一统”、“天下为公”等大同思想的萌芽。他的对于正名主义的发挥，仁道思想的提倡，都可以从上述这些历史前提下，找到适当合理的解释。这样，就规定了孔子在当时，就其总倾向来说，是一个尊重传统文化，顺应时代精神，思以文化教育力量促进社会文明、人民幸福的富于理想的维新人物。过分抑低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恰当的。

《论语》一书，实是孔子平生应机作教、适会多途的作品。或与时君抗厉，或共弟子抑扬，或自显示物，或混迹齐凡，问同答异，言近意深。盖七十二子之门徒，共所撰录。观其疏通妙理，审度人情，必举其征符而辨其骨理，信孔学的真谛。昔赵普称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要非过言。我们如要研究孔学，《论语》一书，实为要典。自魏何晏《正解》、梁皇侃《义疏》以下，代有专著；而宋朱熹《集注》，几为千百年来士子诵习兼以应试的钦定教科书。近人自刘宝楠、钱穆、杨树达、杨伯峻以下，皆有新解问世。吾友施适生执教多年，积有心得，取其讲义重加理董，并吸收先哲暨时贤研究成果，汇成注译新编，示我索序。因缀平时论学宗旨，藉供印证，并赘数韵，聊申赞叹云尔：

论语三家异章句，何皇义解树宗风。

多君博学能知服，簇簇新编允执中。
漫夸半部治天下，问学为政堪启蒙。
春风沂水盍言志，是真孔学不盲从。

一九九一年辛未夏平阳苏渊雷仲翔甫时年八十有四

前 言

《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散文集，内容涉及哲学、教育、政治、文艺等许多方面，由孔子的门人和他的再传弟子辑录他平时的言谈、答问及弟子间的相与谈论而成，它是儒家的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为研究孔子思想学说和儒家理论的主要资料，全书共二十篇。文字简约、朴实，辞义精蕴。它对后世的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等都有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其中某些带有总结性的言论，为后人所引用，并逐步发展而为格言或成语，也丰富了后世文学语言宝库。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的思想学说中的不少内容，经过二千多年的锤炼与发展，有的已成为我中华民族的普遍的道德规范和准则，有的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西方的民族文化，它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无可否认，孔子是位有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历来国内外不少学者都对他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尤其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重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再评价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工作的蓬勃开展，世界上，特别是远东经济较发达或发展较为迅速的日本、新加坡、韩国、香港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兴起了一个儒家思想新的研究热点，研究它与当地的经济、发展、人们的社会道德和社会文化的密切联系与难以泯灭的影响。国内外

学术界对以儒家思想为重点的我国传统文化，也曾举行过专题研讨会，大家见解也不尽一致，褒贬各异。其实，对儒家思想学说的评论，也是对孔子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估。因此，我们要阅读《论语》，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孔子的简单生平。

孔子(前551—前479)(鲁襄公二十二年——鲁哀公十六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邹邑(今山东曲阜东南)昌平乡阙里人。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父亲叔梁纥是个武士，立过战功，被封为邹邑大夫。传说，叔梁纥生孔子时已七十岁。母亲姓颜，名征在，时年十七岁。孔子三岁丧父，随后颜氏带着孤儿迁居到鲁国国都曲阜的阙里，过着贫苦的日子。

颜氏很重视教育。孔子自幼好学，十五岁左右，母亲去世。所以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他“学”什么呢？学礼、学道、学六艺，他努力在学问、德业上不断提高自己。

二十岁开始，孔子在鲁国做过两次小吏。二十岁任委吏(管仓库)，二十一岁任乘田(管牛羊)。

春秋末年，孔子三十岁左右，他不仅已学会了作为一个要参与贵族政治而取得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必须学会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且已融会贯通了后人尊之为“六经”的更为高级的六艺：《诗》、《书》、《易》、《春秋》、《礼》和《乐》。这样，孔子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观、伦理观和政治观。这就是他所说的“三十而立”的“立”字的内涵。概括起来说，这个“立”字的含义，亦即上述“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学”字的内容。所谓“三十而立”，事实是指孔子思想上的礼与道的观念和修养的确定。

三十岁以后，孔子的道德与礼仪的修养，渐趋成熟，并

树下了牢固的基础。他开始设立私学，收徒讲学。

孔子三十五岁(前517年)(鲁昭公二十五年)，因鲁国内乱而离鲁去齐国。途经泰山时，见一女子在哭亲人，听她诉说丈夫在此遇虎害而死，却仍不愿离开如此危险的地区。于是孔子慨叹说：“苛政猛于虎！”

孔子到了齐国，齐景公没有用他，齐大夫又扬言要害他，他即于匆忙中返鲁。自三十七岁(前515年)(鲁昭公二十七年)至五十岁(前502年)(鲁定公八年)，孔子在鲁国，因不愿与权臣同流合污而未曾出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并广收弟子。这十几年是孔子在教育事业与思想学说上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他的道德与礼仪修养在“立”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和渐臻完善的阶段。所以，他概括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

到了五十一岁(前501年)(鲁定公九年)，孔子才正式出任鲁国的中都宰(中都县县长)，继而又做过司空和大司寇。他在任县长时，制订了几项至今仍有进步意义的原则措施：“长幼异食，强弱异任。……路无拾遗，器不雕伪。”提出了正常的分配与劳动的制度和道德与经商的规范。

孔子在五十二岁(前500年)(鲁定公十年)到五十五岁(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期间，做了三年司寇，显示了他卓越的外交才能，帮助实现了鲁国与强邻齐景公在夹谷(今山东莱芜)会盟的大业。

五十五岁以后，孔子由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不被接受，弃官外出，走访了列国，宣传自己的主张，讲述自己的学说，求仕谋官。他到过卫、陈、曹、宋、郑、蔡等国，可是他的“仁政德治”的主张，终究没有被各国国君所接受。这样整整走访了十四年。行程中他不断同人讨论政治和伦理等问题，

求仁的愿望始终没有得到实现。结果在到处碰壁之后，怏怏而结束了自己的流浪生涯，于六十八岁返回鲁国。那时鲁国当政的季康子虽亦礼迎孔子回来，然而政治上还是没有用他。孔子就在“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心情下，终于摈弃了求仕的愿望，专志于教学工作和古籍整理。在七十岁（前482年）（鲁哀公十三年）至七十一岁（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期间，孔子在鲁研读《易》，修《春秋》。孔子于求仕无门，壮志未酬的情况下度过了一生，终于在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三岁。他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的一生对我国古代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十几个世纪过去了，一部以记录孔子言行为主体的《论语》，在历经了二千年前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二千年后“四人帮”的“大破四旧”的浩劫之后，又呈现出了它应有的客观价值。它告诉了我们一个真谛，《论语》中所体现的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份是经得起时代的冲击与考验的。这也是它真正的不朽价值之所在，吾人笃学、勤思付诸行动，其必有成矣。

《论语》体现了孔子的主要思想。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一种涵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它包含了忠、恕、孝、悌、智、勇、恭、信等，经常通过循礼来表达，所以它与礼有密切关系。如果以孔子回答学生樊迟所问的关于“仁”的含意的回答说，就是“爱人”，（《论语·颜渊》）我觉得这是对“仁”的最完善的解释。这是广义的理解。《论语·颜渊》里又对“仁”作了如此的认识：“克己复礼为仁”。“礼”是泛指奴隶制或封建制的贵族等级制度下的一种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简言之，“仁”也就是从家庭出发的“尊卑长幼，贵贱亲疏”的有差别的